

台籍老兵史料與文學座談會紀錄

紀錄——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

攝影——楊蕙如、覃子君、張信吉

時間：2017年12月6日下午2點30分

地點：本館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廖振富館長

座談人：宋澤萊、巴代、鄭燭明、岩上、馬翊航

紀錄：張信吉副研究員

廖振富：探訪岩上時，得悉他的大哥是臺籍老兵又陷入國共內戰而定居大陸，故事離奇感傷，我鼓勵嚴老師寫出來，已刊登於近日出版的《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七輯》。臺灣人經歷二次大戰之後，無故捲入國共內戰，甚至有人輾轉加入韓戰；時間溯前還有日治時期的臺籍軍伕，陳千武的《我要活著回來》，李展平的《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都是這個主題傑出的作品，李展平就曾做過台灣人無故捲入戰爭遭受國際戰犯重刑和死刑罪責的調查報告。這些故事是龐大的歷史議題，然而透過文學書寫與閱讀的過程，也是我們面對台灣過往歷史遺產的適當方式，今天的座談會邀請老中青作家，以文學為媒介來談老兵議題，也留下一些文字記錄。我先邀請岩上來談談他的故事和書寫。

岩上：謝謝館長的鼓舞，史料集刊我發表了〈一張「共匪傳單」的飄落〉一文，寫二戰之後臺灣社會捲入國共內戰的慘境。過去我在笠詩刊和自立早報也發表過這類主題的作品。我大哥原在嘉義郡役所工作，國民黨來臺後，因語言障礙而失去工作，國民黨以學說國語每月領薪餉，半年結訓安排就業誘

騙，當時台灣失業青年二萬多人入伍。

他在1946年6月1日編入陸軍第62軍第95師284團，從此音訊全無。事後才知移到礁溪受訓，9月1日從基隆上船，9月4日登陸秦皇島，參加平津會戰、上海戰役，戰場在河北保定、天津、北平、上海，有書信用日文書寫寄回。1949年5月上海戰役，中國全部被「解放」，從此失去聯絡。這批沒戰死的台灣兵全留在中國。後來我知道我大哥從上海一路當乞丐，逃亡到廈門，三個月時間歷經他最痛苦的一段人生，後來加入人民解放軍。1950年6月韓戰爆發，1954年1月23日1萬4千多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俘搭美國軍艦抵基隆，我母親曾努力打聽大哥消息，悵然無果。1977年8月母親過世，當年冬天我們輾轉撿到共匪空飄傳單，長20公分寬12公分，彩色白底印刷，正面紅色橫寫標題：「共產



詩人岩上父女合影。



廖振富館長主持臺籍老兵史料與文學座談會。

黨對臺灣同胞無比關懷」，副題：「台灣同胞嚴振章幸福生活在祖國大陸」，我透過傳單上的資料，分別從香港、日本、美國寄信過去，經過很多方法終於聯絡上，秘密通信10年，1988年解嚴後第2年我和大哥在上海見面。後來我也為大哥辦了兩次回台申請，他很羨慕台灣的進步，但是也有認同模糊的深沉悲傷。

臺籍老兵史料的整理很重要，也盼望相關作品能成為文學史的一部分。1989、90我發表過〈接大哥的信〉、〈隔海的信箋〉詩作，記錄這個苦難。

廖振富：講到與大哥死生重逢，老年凋零的感慨，岩上眼眶紅聲音有些哽咽。正如我最近讀到巴代書中講的，我們都是大歷史裡渺小的沙塵。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人奮力做著鼓舞人心的事。有關老兵議題的書寫，文學台灣基金會特別辦過兩屆許昭榮文學獎，接下來請基金會董事長鄭明發言。

鄭炯明：我的發言主要分兩部分，一是介紹許昭榮和許昭榮文學獎，另一是作品的分享。

近年來談論台籍老兵，許昭榮（1928年11月13

日－2008年5月20日）是十分受矚目的人物。他是屏東枋寮人，前臺籍日本兵及中華民國海軍的退伍軍人、臺灣前國軍退役軍人暨遺族協會前任會長、臺灣獨立運動參與者，生前不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的臺籍日本兵、臺籍國軍、臺籍共軍的權益奔走，2008年5月20日因抗議政府對臺籍老兵暨遺族不聞不問而自焚身亡。因為他奔走，臺灣歷代戰歿英靈的議題逐漸為人重視，目前旗津海濱的「高雄市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紀念戰後國共內戰的臺籍老兵、臺籍共軍、臺籍國民黨兵。2008年成立的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與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總共舉辦了2屆許昭榮文學獎的徵文，第3屆因為稿源不足而中斷。以文學為臺籍老兵發聲，第一、二屆首獎〈勿忘影中人〉、〈台灣兵•達腦〉，其他還有評審獎和佳作多篇，分別在2013、2014年集結出版專書，其中也有書寫從中國來台的老兵，無法回鄉，被騙被擄而從軍來到臺灣，這樣的故事也獲得評審的認同。

臺籍日本兵議題，陳千武的詩〈信鴿〉和小說《獵女犯》可說是名篇。陳千武從1967年寫到1984年總共16篇小說，當年出版改為《我要活著回



詩人鄭炯明。

來》，序詩〈輸送船〉發表於17期《臺灣文藝》，小說主角林兵長在帝汶島戰場上護送慰安婦時，認識福佬系的當地混血女性賴莎琳，兩人的幾段對話發人省思。《文學界》第5集(1983年1月)刊有桓夫作品討論會，在座的宋澤萊也有參加，認為日治時代的文學史除了賴和楊遠龍瑛宗之外，陳千武的作品見證了被徵調至南洋的戰爭經驗，同屬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的立場。我認為陳千武的小說並沒有用一種仇恨的心理或強烈的指責日本帝國主義，而是站在「人」的立場，觀察當時發生的情形，雖然他自己也是一個受害者，人的生存唯有在人性條件下才有意義。

我當兵時分發到小貝湖畔擔任醫官，目睹很多大陸撤退的老兵經歷苦難的人生。當時我以一個班長的獨語〈隱藏的悲哀〉來摹寫他們的心境，我想這些都是人性遇到別人的苦難的一種自然體會。

宋澤萊：有關於二戰到南洋戰場的台籍日本軍伙問題，我曾寫過我的父親，短篇小說的名稱是〈最後的一場戰爭〉，中興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朱惠足教授與研究生李展平都作過研究。

我父親今年92歲過世，1943年當日本的志願軍，派往南洋作戰，當時我父親是18歲。志願軍是比較好聽，其實是軍伙，也就是當軍隊中的雜役，戰場在沙巴島，位置在菲律賓南方。這個島在二戰之前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與菲律賓或馬來西亞的西、南部不大一樣，戰後才與馬來西亞的西、南部合成一個大馬共和國。在戰爭其間是屬於日本人所歸劃的「大印度尼西亞軍區」的一部分。我父親是1943年從高雄港出發，搭船到南洋，沿途已經有盟軍在海面上佈了水雷，險象環生。

他們隨軍到沙巴島是開採石油，地點是山打根(Sandakan)，在沙巴島的東岸，這個地方盛產石油。日本人在這裡開發了兩個石油田，規模不小。我父



小說家宋澤萊。

親的任務是督導當地人為軍方作工，也學會了一些印尼話。之後不久，就遇到了麥克阿瑟盟軍的反攻，沙巴島是跳島攻勢的攻堅地點。盟軍猛轟海岸線，炸毀了兩座油田。日本的司令官下令大撤退，不論是台籍軍伕、日本軍人、監視戰俘員都進入叢林，朝西岸一帶遷徙，人數不下千人。當時，西岸到東岸距離有幾百公里，沿路都是不曾開發的熱帶叢林沼澤，逃亡的人因缺乏糧食而飢餓困乏，也無法抵擋叢林的熱帶螞蝗，尚且要逃離澳洲軍的噴火唧筒與飛機的攻擊，一路走一路死，甚至有吃人肉裹腹的悲劇產生，能活下來的人很少。

我父親後來被澳洲軍俘虜了，遣送到新加坡的盟軍俘虜營，住了一段日子，最後戰爭結束，搭船由基隆上岸，回到家。

臺籍日本兵在南洋其實有很多不幸遭遇，例如有些人擔任日本戰時監視戰俘員，在俘虜營專門監管被日本俘虜的盟軍，主要都是澳洲軍，戰後因為曾經對待戰俘態度殘忍而被追究，臺籍監視戰俘員就必須以國際戰爭罪犯的身分被審判，根據李展平的《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一書的調查，台灣人捲入戰俘問題遭受死刑或絞刑26人，147人被判重刑。

巴代：我在2010年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寫一個部落的「臺籍老兵」陳清山老先生的故事。但在這之前的好些年，說起「臺籍老兵」，我的認知卻是指二戰後期，日本徵召前往南洋參與日軍軍伕。那時，在我所認識的原住民社會運動人士，以及檯面上政治人物提起二戰時期的臺籍原住民老兵，甚至以記錄中的「高砂義勇隊」來指稱1945年前投入戰場的原住民戰士。當然，我所知道的一般人也以為「南洋」



小說家巴代。

「高砂義勇隊」就是這個故事的全部。但實際，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還有一批台灣青年離鄉參與國共內戰，甚至韓戰，而各有遭遇。

不論1945年前「高砂義勇隊」的臺籍原住民日軍，或者之後的，一直不為人知的參與國共內戰的臺籍士兵，於我而言，卻都是遠在在天邊，近在咫尺的真實事件。我的村子（台東縣卑南鄉泰安村）先後有七名參與了「高砂義勇隊」，大伯Dinlaw，二伯Aulang還活著回來。記憶中，每一回大伯來家裡走訪，喝上兩杯之後，特別喜歡吹噓他那一段歲月的勇猛。但我從來不當真，那個時期，部落的每一個成年男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值得一吹再吹的故事與經歷。我並不認為那是一回事，我甚至在「高砂義勇隊」的議題被大炒特炒的那幾年，我也沒有意識到把大伯與二伯的經歷連結起來。直到準備寫長篇小說《走過》才確切知道，這兩批「臺籍老兵」的不同。

1945年12月24日村裡來了載著高官的黑頭車，然後在部落「巴拉冠」（男子會所）廣場招開一場說明會，說要招募可以到「祖國」建設的工作人員，一個月兩千元的工資霎時吸引了部落22名青年的簽字參與，這幾乎是每戶都有人報名。第二天扣除兩員體格不符的，其餘20人，便由臺東出發，從此展開離鄉47年的奇特經歷。後經花蓮、宜蘭到達基隆，才發覺這是「從軍」而不是「參與建設」，隨後轉經淡水、台中、鳳山不斷的移防、訓練，並於1947年1月搭船到上海，陳清山老先生參戰、受傷直至1992年才回到故鄉。

2003年我在部落「大獵祭」的獵寮與陳清山老先生正式相識，我提及可以為他寫一個戰場經歷的故事整理，數天后，他拿了一份大約一萬兩千字的自傳手稿，我也正式展開了蒐集資料與田野調查。隨著資料閱讀越多，思慮的細節與脈絡越來越清晰與深沈，我才驚覺這些長輩的故事，絕非僅僅的「戰史」或者「記錄」可以展現的。那些悲傷、絕望，那些腐蝕意志的思鄉之情，那些在戰場不同情境的掙扎與拼搏的絕決意志，需要一部夠長夠厚的小說好好敘述與一起痛哭。於是我琢磨了好些年，調整了好些年，一路隨著陳青山先生的經歷哭哭啼啼的寫了24萬字來說這些事。我有理由相信，當年這些青年離家未歸，他們的父母必然因為極度思念，以淚洗臉度日；但我也相信，一些年過去之後，親人們在現實生活巨大壓力之下，對於這些離去的親人，早已經視為跟早些時候離家討生活的家人一樣，各自離散，成家或殞落入土，想起時，已經少了悲痛、控訴，反而是一種哀傷、懷思。一如我的母親在述及自己的親哥哥，早在1947年2月就戰死在江蘇山東邊界時，語氣總是帶著淡淡的遠遠的哀傷或說思念。

如今，我們聚集再提及這些事，期望對活著或已經過世的當事人，能做點什麼，更期望永遠別再發生這樣的事。

廖振富：宋澤萊、巴代都曾擔任軍官，宋澤萊有關老兵的作品有些與軍官歷練有關，巴代則是從部落出發，不一樣的背景讓作品延展的議題更多元。今天也特別高興年輕世代關心老兵的議題，馬翊航的研究聚焦在此，可以讓我們有系統地觀察與評論。

馬翊航：我自己的博士論文，處理的就是1949之後台灣的戰爭書寫。其實終戰是1945，但我選擇1949，為的就是去處理這種，各種戰爭經驗共存下的戰爭狀態。在真正開始撰寫博士論文之前，我很晚才接收到「台籍老兵」這個特定的名詞。甚至是在讀了巴代老師的《走過》以後，才比較知道，原來在台灣，有許多像《走過》主角陳清山老先生這樣，走過三個國家系統的戰爭生命。

台籍老兵牽涉出的歷史問題很多，我想在史料上，我自己不是專家，我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時，也借助了許多史料與相關論述。我可能可以與大家分享的是，我也許可以以一些文學作品作為例子，去理解，文學作品怎麼樣透過他的美學選擇、歷史承擔，為我們描寫戰爭過後，那些複雜，難以平復，值得記憶的生命圖像。藉此，我們是問三個問題：

一、戰爭留下了什麼？

戰爭的多重殘餘現象，是迂迴的。那當然是因為戰爭帶來的創痛這件事，本來就是難以言明的。從黃春明發表於1988年的散文〈戰士，乾杯！〉，感受戰爭餘留在台灣社會中，複雜、沉重卻又難以消化的戰爭「面孔」。文章記載，1973年的夏



作家馬翊航。

天，黃春明因為籌拍紀錄片《芬芳寶島》而造訪屏東霧臺鄉的好茶部落。他在一位原住民青年的住家牆上，看見三幅人像。照片中的人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戰役下亡逝，有戰死在菲律賓的日本兵，參與國共內戰卻又被意外擄去成為「共匪」的「匪兵」，以及在突襲任務中不幸戰死的蛙人。「這般荒謬的情形，在今天這個世界裡，恐怕更難找到了吧。」作者作為一個雙重意義的外來者（進入村莊的「外來」、漢人相對於原住民的「外來」），這些戰爭影像給予他難以承擔的震驚經驗。那些肖像「逼視我的眼神」，使「我的心變得好脆弱」。某種雜亂，無法彌補的歉疚感圍繞著他，酒力催逼之下，他呼喊著「戰士，乾杯。」戰士的身影恍然迴盪在歌聲與燭火間，直至淚水沒入了黑暗……。「乾杯」，不只是以敬酒儀式來化解原漢的矛盾，其後的醉酒與失憶，更反映了短時間內他難以消化、處理、哀悼的歷史情感。當下的交

談，飲酒，以及寫下〈戰士，乾杯！〉，可以說是黃春明對這場驚異旅程的應答——即使那已經是15年之後。而那些恍惚，衝擊，憤怒，與疑問，都是戰爭微小而劇烈，潛伏在生命暗處的遺緒與餘波。

我在處理博論的時候，主要雖然處理文學作品，但也會需要去看口述歷史相關的東西。1977年有一個在當時非常重要的座談會，臺籍日本兵座談會，當時不同身份的長輩，輪流發言，所有人幾乎講到超過時間。這些講到超時的長輩，許多人都觸碰到一個核心：過去不能說的，現在我要暢所欲言。很多人都說，這些事情以前都不能提，都被視為禁忌。那現在我們能提了，我們要把我們很痛苦的記憶說出來。

但也有人說，在那時候的一種感覺，就是累，就是疲倦。是很身體性的。

最近我剛好跟台文所的夥伴的書完成了，叫做「終戰那一天：戰爭世代台灣人的生命故事」。雖然是終戰那一天，但有些故事要反映的，反而恰恰是戰爭難以終結。

我們今天以「台籍老兵」作為主題，我想關於台籍老兵，或者是台灣人的戰爭經驗，種種議題裡面，許多作品都反映了這些主題。戰爭終結是一個歷史的時間點，對台灣人來說，我們也許可以以天皇的玉音放送來作為一個時間點。但即使是這個終戰的事實，有時候往往都是有時差的，或者是不同步的。例如在南方戰場上，有些散落的部隊，甚至是隔了一兩天才知道這個事實。所以談終戰，或是談台籍老兵的問題，我們關注的，其實是戰爭「留下來了什麼。」這個問題。其實戰爭留下來的東西不只是關於戰爭本身的記憶。或者應該說，關於戰爭的記憶，隨著個人的機運、選擇、位置，其實有無限種的可能。

終戰之後，有一些學者說是進入了另一種準戰爭體制。就是，像戰爭，又不是真正的戰爭。不斷處在這種備戰的狀態。在台灣多重戰爭經驗下的文學作品，即使描繪的是不同的戰爭經驗、不同的族群經驗，但其實都面臨了同樣的一個「台灣的戰後」。反共小說，可能是貼近國家主流戰爭認知，但他也一樣會面臨這種戰後的思想檢查；當然更不用說，台灣人殖民地時期戰爭經驗的被壓抑。這些問題，我認為主要還是出自於台灣戰後這種「準戰爭體制」無所不在的狀態，形成了一種生產與禁制相互聯合的語言環境。這種接近軍事治理的狀態，到現在還是有很多殘餘。例如救國團，例如營隊裡面的值星。但最主要的，還是一種比較嚴密的政治、言論的控管，以及主流戰爭意識的形成。在這裡面，戰爭所留下的記憶與想要敘述的事物，就會跟這個狀態不斷地產生連鎖。這裡面對戰爭，就一直有怎麼寫，寫什麼，被認為寫出什麼的問題。

我所看到的寫作者，就是在這種狀態中持續地回應這些非常艱難的幾個課題。

• 戰爭與債務：

台籍老兵，以一個群體被看見，我們可以從七八零年代軍郵追討行動開始。去追尋這些沒有被認真檢討對待的債務，是實質的，也是象徵的。

談宋澤萊，〈最後的一場戰爭〉。宋澤萊的〈最後的一場戰爭〉1976年發表於《中外文學》，後收入小說集《等待燈籠花開時》。小說主人公福壽伯，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以石油開採技師的名義徵召至婆羅洲，戰爭末期油庫遭盟軍摧毀，福壽伯被遣為野戰砲兵。戰爭結束後，歷經日軍集體自盡、叢林流亡、澳軍俘虜，最終在1947年6月返回台灣。返鄉的福壽伯在學校擔任教職，退休之後擔任里長，繼承祖業成為佛雕師傅，戰爭的創痕逐

漸被彌合、掩蓋，「不要去觸及他，就什麼都好。」然而承受戰爭記憶的不只是福壽伯，他妻子的兩名兄長，同樣也是戰爭的未歸人。福壽伯在妻子的慫恿之下，「在十一月七日張羅一些錢跑到登記處去過了名，政見的第一條就寫上：協助台胞軍伙討回日軍軍郵。」宋澤萊在小說〈最後的一場戰爭〉的開頭，明確地說出了他書寫的姿態：「以這篇小說獻給家父，他在太平洋戰爭中曾做過毫無代價的犧牲。」我們不難理解為是某種「子輩」對於「父輩」戰爭記憶的應答，理解或者承擔。但這篇小說，其實描繪了好幾個層面的戰爭「債務」，或者戰爭本身的多重殘餘：宋澤萊對於家父，或者同世代的戰爭經驗者的敘述慾望、福壽伯代替妻子完成「亡兄」、以及抽象的十八萬「袍澤」未能償付的心願。作家在軍郵追討運動後書寫戰爭債務，所意圖銘刻的不僅只是「索討」的歷程與政治意涵，正如Paul Ricoeur所指出，「債務」（debt）不僅有罪責的意義，亦意味著傳承／遺產（heritage），記憶的責任也意味著傳承。但繼承、傳續不見得是順暢的，當宋澤萊將許多尚待清償的歷史課題，與「父親」自身的戰爭記憶，以及當下人間「選戰」的種種掙扎與拼搏，兩股敘事線交互穿插之時，那場「戰爭」，所指涉的既是南洋戰場的記憶，亦是與國家機器拼鬥的求償，兩者同樣艱難。看似終結的「最後」，所意欲揭穿、應答的，則是難以「完結」的歷史遺緒。

另外，當然還有李雙澤的『終戰的賠償』。

亡靈也是一種責任或債務。例如目取真俊的『水滴』。他的腳開始滴水。有很多的鬼魂開始來吸他的水。原來是因為他在戰爭中見死不救的惡夢。他把他們的水喝完。

• 戰爭與復員／復原：

跟債務一樣，是有一種象徵性的。我想在文學作品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更細微的討論。

二、文學作品與台灣人殖民地時期戰爭經驗

是甚麼？

- 如何在「戰後狀態」中書寫
- 如何書寫戰爭的記憶
- 禁忌與失語
- 戰爭的後遺症：瘋狂與創傷
- 活著回來：倖存者的故事
- 歸鄉的故事，戰爭的框架

這幾件事，其實也可以說是同一件事。如果正如前面所說，早期這些題材作品是在一個相對比較壓縮的環境下來書寫，那麼就會有一些相應的策略與組合。失語的狀態，當然包含了語言工具的轉換，但也可能指向一種精神的禁忌。沉默的多桑的形象，其實是一直不斷出現的。可能是完全不寫，但也可能是書寫的時候，必須去選擇一種貼近主流戰爭框架的方式去寫。例如早期的恩仇血淚記，整體來說，她是必須被放在「抗日」的視角下去理解。另外一種失語，則是直接指向小說中人物的生命情境。如果沒有辦法訴說我的戰爭經驗，那麼那些痛楚，應該怎麼樣修補？在戰後的台灣小說中，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小說，都指向了這種情境。當然陳千武的〈活著回來〉，是一個很精準的隱喻，像他的〈信鴿〉，再死一次，或者指甲。必須有事物去代替那種死亡，或者讓他的生命情境裡面，持續出現那種戰爭寄居在身體裡面的感覺。那並不是清除，或者是再生。而是他的生裡面，不斷地帶有死的成分。活下來的人，必須終其一生去回望那個戰爭。

或是鍾肇政的〈中元的構圖〉。或是七等生的〈回鄉的人〉。

過去可能是用一種，集體記憶，形成認同的詮釋。我覺得這種詮釋是重要的，也是某段時期的階段任務。但我想書寫者，與評論者，其實都在尋找許多不同的可能。

三、戰爭書寫與台籍老兵歷史記憶的可能性 有哪些？

每個人都可以有一種回應記憶的姿態，我們可以從陳鴻森、巴代、吳明益的文學作品來看他們的態度。陳鴻森的〈魔〉正如笠詩社夥伴跟陳千武那種世代的接續。作品這麼說：「那些從戰場上僥倖地／活著回來的傢伙／然而生對於他們／只剩下／行走在異鄉的感覺了」。巴代的《走過》語言情境的變化與身份的變化，讓他不斷地去質問這個國家的荒謬。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則是一種複數的、修補的、交換式的歷史經驗。總而言之，今天這個座談會，對焦文學來學，其實仍有無限宏偉的可能。

廖振富：聆聽大家的發言，雖然我們所追憶的是歷史的殘片，但每個故事幾乎都可以寫成感動人心的作品。戰爭影響人群生活，我們應當不斷建構我們的反省，不要讓過去的歷史失憶、掩埋。文學來自人生，而庶民的生活史需要我們不斷挖掘、不斷敘述，這也是我們今天座談的目的。在黑暗的大時代，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但事實上很多人餘生還受折磨。文學與藝術或能碰觸到人們的苦難，給予某種形式的紀錄與慰藉，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讓臺籍老兵的議題繼續受到關注，也謝謝張信吉副研究員規畫了這場座談。☒